



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 (英)尼克·梅里曼(Nick Merriman) 著
◆ 黄 洋
◆ 高 洋 (复旦大学文博系) 译
◆ 陈 淳 校

引 言

博物馆是让公众重建过去和参与考古的重要和有力的载体。博物馆的大部分历史,相对而言它们都面向行业内部,倾向于为考古学科的学术需求服务而凌驾于广大公众的需求之上。然而,近年来英国的一些博物馆已经开放,更广泛地让人们享受和参与,并开始在当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考古博物馆采取的这个转变是针对观众,主旨在于接近、积极参与、乃至解决脱离社会。本文我将探讨一些正在英国实施的举措,认为某些举措代表了一种新的途径,面向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更加公众取向的概念,以平衡过去过分强调学术界及其“后辈”的需求。

博物馆的力量

从长远来说,博物馆可以被称为大众媒介。他们不像电视或电影有日常的观众,但是日积月累,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大量的人参观。因此,博物馆的一个展览有年观众量10万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比如说25年)会有大约2.5亿人参观。在英国,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总的来说要比看足球比赛或其他体育转播更普遍。美国考古学会最近一项调查证实,很大比例的人口会参观考古博物馆。这项调查来源于有统计代表性的1,016名美国成年人样本,发现88%的美国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曾经参观过博

物馆陈列的考古材料。

博物馆是有代表性的强大媒体,因为它们涉及的是据称带有身份认同和真理的真实材料。它们的具体性、它们拥有的“证据”、它们正式的地位,它们与学术的关系,给予了博物馆比许多其他代表性媒体更大的权威和真理话语权。正是这些,使得博物馆在声张国家或地区身份的斗争中和压制他人的主张中成为重要的象征。因此,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建造博物馆直接就是为了促进新兴国家的新认同,更常见的是要构建一种有序、自律的公民社会,以便远离陷阱的诱惑,并对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感到满意。

19世纪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利用考古证据来从时间上向前追溯当下国家疆域内共有认同的看法。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当下地理疆域内收集过去的物质材料,并用它们将其置于悠久过去的背景中来证明现在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同样,在20世纪,纳粹政权通过利用古日耳曼遗存来证明他们所宣称的“大日耳曼”的正当性,并利用博物馆对这些物质文化的展示,来证明他们侵略和对待某些劣等民族的正当性。

对于普通大众、竞争的利益群体、政客、经济学家、记者和学者来说,博物馆——包括考古博物馆或者拥有考古藏品的博物馆——一直都十分重要。

^{*} 译自:Merriman, N., Involving the public in museum archaeology. In: Nick Merriman (ed), Public Archa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4, 85~108.

它们一直都是文化和城市的有力标志,它们被用来作为重振经济和恢复区域认同的先锋,就如我们在新建的苏格兰博物馆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一直都是冲突中的重要目标,为了抹去身份认同而进行掠夺和毁坏,就像最近在科威特、波黑和阿富汗所见到的那样。

然而,尽管有这些可观的观众数量,尽管博物馆所称的重要性被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由此产生的争议所证明,但是它们在具体宣传过去时是否有效?我曾经在其他地方声称,博物馆建造者意在公众中传播认同的意图被博物馆观众对博物馆许多不同的解读所颠覆,还因为许多社会群体根本就不去参观博物馆。结果,博物馆的作用及其主要历史与社会上受过教育和拥有共同文化的优势群体相联系,并且排斥其他群体。因此,直到最近,考古博物馆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它们作为展示构建文化认同原始材料的陈列室所发挥的象征作用,而未必通过它们所成功发挥的较广泛的教育功能来体现。

为考古学服务的考古博物馆

收藏考古证据、在与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景观中做合理的展示,一直是要求考古博物馆所起重要作用。强调“真实证据”意味着,对大部分考古博物馆的历史而言,一直集中在对其藏品的保存和证据提供上,以及满足考古学的学术需要。例如,即使近些年,欧洲一个有关博物馆考古学会议出版的文集中。一篇总结文章仍然把博物馆考古学家的角色定位在进行田野考古以及保存调查发掘的结果。

与大多数其他博物馆相同,其大部分历史,考古博物馆一直都是“自上而下”的机构,馆长将展览提供给被动的受众。这些馆长是在考古领域而非传播(communication)领域受训的,而博物馆考古学家们倾向于向考古界其他领域的同行、而不是非专业的公众寻求支持和认可。

很难获得具有轰动效应的田野发现,明显需要处理大量储藏材料并为考古界其他人服务,进而集中在管理问题而非观众,导致了考古博物馆的边缘化,被视为远离今天大众的兴趣。确实,最近对英国考古档案和藏品使用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收集它们花费了巨大的资源,但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少利

用它们,更不用说广大公众了。相同的“管理危机”(curation crisis)也在美国和日本被提及。

不关注公众需求的结果是很严重的。在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当本地居民被问及他们想在一个计划新建的社区博物馆里面看到什么东西时,大部分人回答说,他们只想要自己祖辈记忆所及年代之后的东西。结果,自史前期到中世纪晚期的本地考古材料,在这个博物馆里无一席之地。通过询问,今天族群差异很大的社区,对此不感兴趣或认为与他们无关。

转向公众

然而,正是这一社区博物馆运动,掌握着理解当今一些考古博物馆所感受变化的钥匙。从1960年代起,如同其他博物馆一样,考古博物馆开始体会到通过使用模型、立体展示、“复原”和视听技术等一系列展览科技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就如菲什伯恩罗马别墅博物馆(1986年开放)和伦敦博物馆(1976年开放)首创的那样。这些使得博物馆对观众更具吸引力,并结合更多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展览,加上一种在变化迅速的时代希望把握史实的真切愿望,导致了1970和1980年代的“遗产热”。诸如约克郡维京人中心(1984年开放)的经验,看来显示了考古学能够赢得公众喝彩的一条新途径。美国“重新展示”和第一和第三人称阐释的成功,导致了它在诸如铁桥等旷野遗址的采纳,以及用于考古遗址和博物馆的临时特展。

尽管这一时期的发展证明了博物馆和关注其他遗产的大众化,但是这种进展却受到某些学者严厉批评,认为这种对过去的阐释是心安理得和怀旧的,并且带有倾向统治阶级的偏见。特别在考古学领域,香克斯和蒂利声称,像伦敦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通过“压抑矛盾,把过去当作现代表象的一种反映来构建”,使现在的社会关系合法化。据称,解决这种失策的办法是,在博物馆展示中要更加自我反省、多为其社区本身着想、与不同的利益团体合作、并要体现不同的声音。

社区博物馆运动已经以各种方式显示出这些可以做到的办法。从1960年代开始,质疑传统价值观和促进民权的政治气候,逐渐导致了对博物馆及其角色的反思。这一运动似乎是从华盛顿特区的阿

纳卡斯蒂亚地区博物馆开始的,在那里,史密森研究院于1967年在一个黑人社区建立了一个分部。大约同一时候,在里维埃和德瓦兰思想的影响下,生态博物馆运动兴起。在这些新型博物馆中,主旨是在筹建博物馆中由当地社群参与和介入,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博物馆是由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所经营,并面向他们。

参与和包容规程

近来,部分受到社区博物馆成功的启发,并基于希望保证公共服务为纳税人负责及为整个社区的需要服务,政府给了英国博物馆一份更明确的社会规程。在一份包含有发展教育、解决社会歧视、为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宣言上,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要求所有部门为实现这一揽子规程制定方法。结果,负责考古与博物馆的文化、媒体、体育部,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在其资助对象中将鼓励教育的、参与的、社会覆盖的项目放在首位。这个规程与当地政府的业已赞同的途径不谋而合,并影响到其他提供资金的机构,例如遗产彩票基金,该基金也将参与文化遗产和发展教育服务放在首位。结果,可能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公共资金支持的博物馆共有个对外看的规程,将公众放在藏品管理之上。这本身已反映在英国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定义的修改上,从主要集中在处理和收藏的定义(一种为了公共利益收藏、论证、保存、展览、阐释物质证据与相关信息的机构),变为强调结果和观众的定义:“博物馆能使人们为启发、学习和享受探究藏品。它们是收藏、保护替社会托管的人工制品和标本、并能使这些藏品为公众所用。”

结果,考古博物馆发现它们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即为它们提供资金的机构以及大部分公众都希望它们建立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让当下的观众参与进来,不仅与传统观众相关,而且能扩大影响,将以前通常不参观博物馆或对考古学没有特别兴趣的观众吸引过来。同时,博物馆工作者应当批判性对待利用博物馆来执行政府政策的政治压力,迄今为止,博物馆朝更多融入社会的方向前进已获益菲浅,为博物馆与他们实际的和潜在的观众联系更加紧密提供了期望的推动力。

结果,仅从身体上和智力上定义,或进一步从身体上、感觉上、智力上、态度上和财政上重新加以

定义,扩大“参与”近些年来已经成为英国博物馆发展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我现在要转向审视某些方法,其中面向公众成为博物馆考古学家的工作。

数码通道

接近考古藏品的一条主要路径,就是把藏品信息和图片放到网上,这能打破博物馆四壁的限制而让观众参观。

长期以来被视为枯燥但为说明目的而必需的东西,博物馆文件资料通过数码技术变成了参与和交流的一个要素。有些博物馆,比如汉普夏博物馆服务部将他们的藏品信息简单地放到网络上,虽然未经整理,但是可供任何感兴趣的人搜索。伦敦大学的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已经为其藏品的全部78,000件器物建立了完全的在线说明目录,并计划建一个虚拟博物馆,并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由皮特里发掘出来的其他埃及考古材料链接,先与曼彻斯特博物馆莱洪遗址的发现物建立特别的链接,因为这两个馆都拥有这个遗址的东西。在格拉斯哥的亨特博物馆,有可能看到史前雕刻石制品的“实物电影”——通过点击物品,它们可以被旋转,从各个面和角度加以观察。

许多博物馆已经超越实物,利用网络创建虚拟信息资源。在纽卡斯尔大学的古物博物馆,人们可以观看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的一个“虚拟展览”,进入哈德良长城的教育网站,通过室内移动和点击感兴趣的要素来探索该馆用三维重建的密特拉斯神殿。

在英国以外,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考古博物馆是可从网上参与并获取信息,在博物馆场景做考古学全面探索的博物馆之一。同时提供如何找到博物馆(包括网上地图)和当前举行那些活动的信息,网站还提供目前和过去的展览、在博物馆里和其他如夏令营、公众发掘日、考古遗址游等活动举行的“考古冒险课程”的细节。“儿童页面”提供在线或可下载的活动、如何参加交友项目、成为一个志愿者或申请实习的细节。那里还有关于出版物和营销的简短网上目录,附有可下载的订单表,并为刺激参观,现场游客可以用“电子代价券”在博物馆打折。此外,还有关于藏品怎样看管和保护、收藏政策的摘要、如何建造新库房设备的细节、对考古保护和做金属探测的法律解释、以及供考古学家下载

的表格如“考古学初步评估申请表”等“幕后信息”。最后,还有本地现在或过去发掘的遗址的各种信息,主题从亚历山大时代的历史,与本城镇考古相关的出版物目录。

大多数网上参与会让远程访客进入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网址。但是,有些博物馆开始开发网络潜力来进行互动和广播。2000年,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对兰贝德戈奇一处维京时期聚落的发掘,成为一个名为“挖掘维京,正在进行的考古”项目的焦点。也许借鉴了电视连续剧“时间之队”的模式,一个网页被设置来提供发掘背景、发掘队及其工作的细节、遗址报告、遗址规划、教育信息并每天更新。欢迎有疑问的人将他们的提问用邮件发给考古队,考古队每天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再进一步,在萨福克的埃尔福顿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个大英博物馆小组体验了网络直播,其方式和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对默西塞德郡作为杰森计划一部分而从事的科学探险相似。

数字媒体显然已为获取博物馆考古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维度。但是,它们有时并非看似那样的万应灵丹,因为网络通道一般受制于负担它的资源。通过人民网——把所有图书馆都在网上相连,还有在线文化——一个用来提供数码内容的新的政府机构,对网络通道作进一步的分工,也许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目前互联网用户和打算去参观博物馆的人数量相当。对于既不参观博物馆也不上网的人,也许年轻人除外,他们可能更愿意上网而不愿意参观博物馆。

同样矛盾的是,利用数字媒体来“接触”博物馆考古藏品,实际上会因令人们关注其数字化的复制而使人们远离真实器物本身。尽管数字信息会提醒观众存在某些藏品,并鼓励他们去观看这些实物本身,但是数字媒体是否能比书中的图片提供更多的“接触”则并不清楚。

幕后故事

不管怎样,另一种参与规程确实能让用户更紧密地接触到博物馆藏品本身,例如,通过开放库房和其他的诸如保护设施的后门、通过将藏品交由发现中心和文物外借盒、和通过博物馆建筑本身以外的一些项目来处理。

从考古学相关性而言,开放过去远离公众视线

的库房藏品,意味着在展览实体中提供可以拉开的贮藏抽屉,例如在圣奥尔本斯的维鲁拉米恩博物馆一个再现维多利亚传统所见,或它意味着在一个公众可参与的资源中心,所有藏品都对外开放。例如,伦敦博物馆的伦敦考古学档案和研究中心约有3,000项发掘的完整档案可供学生、研究人员、考古界和感兴趣的一般公众所用。没有类似资源来建立如此设施的其他博物馆,常常会有公众开放日,提供有指导的幕后参观,在那里观众们有机会参观库房里的东西,并向馆长提问。

开放博物馆也令以前隐藏的过程公开让大众审视。对于考古学来说,这似乎始于约克郡的考古资源中心,这个中心自1990年开放以来,不但允许观众目击文物处理和分析的过程,而且让办公室装上玻璃墙,这样可以看到正在工作的考古学家。

威尔士国家博物馆通过其“凯尔特武士”项目,将考古保护从实验室移到公众面前,提供了一个设计来展示各种物质如何残存和朽烂的室内表演。“武士”(由一名博物馆员工扮演)和他的服装和武器向观众作了介绍,然后在观众帮助下将他“埋”在一个土墩下面。这个武士通过一个地板门转移,代之以恰如考古学家发掘时的墓葬。然后,保护工作者和观众讨论武士遗体、服装和随葬品的不同部分在埋藏过程中如何发生变化。使用X光、显微照片和其他工具,他们接着展示,怎样的发掘和保护能够发现原来可能堆放的东西。最后凯尔特武士返回,于是观众可以再次将原先放在坟墓中的东西与保护工作者的工作进行比较。

发展公众参与文物保护最有雄心的尝试是在利物浦的文物保护中心,它是默西赛德郡国家博物馆与美术馆的一部分。该中心为博物馆各部门的文物保护需要提供方便,包括考古学,并且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来促进公众的参与和理解。它有一个观众中心,一周开放七天,以一个互动的展示解释保护的过程,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观众可以坐在一个小的演讲厅,那里有一个与实验室相联的现场视频直播。他们能利用这个连接与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保护工作者进行积极的问答讨论。实验室本身在规定的时间内也可以参观。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将过去隐藏的博物馆功能放到公众视野中的首创特征之一,是看似只有技术过程本身被公开。比如,博物馆必须承担存放和保

护功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有关收集、处置和保护道德的争议与展示无关。看来观众是被邀请来欣赏藏品内容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科学能力,而不能质疑他们这样做或为何这样做的根本问题。

触摸历史

让观众进一步接触考古藏品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打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允许触摸和把玩部分藏品。很大程度上,这是受到了动手发现中心发展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和科学原理有关的中心,1969年旧金山建成的探索馆就是其中之一。欧文总结了最近在考古博物馆中动手式学习的方法,表明发现原理的学习很适合于考古藏品。

对考古学而言,先驱性的“发现中心”当属约克郡的考古研究委员会,它主要关注为预约的学校团体和家庭观众提供动手的体验。参观者整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将们归类(陶器、骨骼等等),并且被鼓励通过这种实践来理解考古过程的某些内容。工作人员在现场全程参与并通过回答问题来指导参观者。

考古研究委员会通常是一个独立的、完全从事考古的机构。较普通的是一般性的发现馆,其中考古学和其他学科一起发挥作用,比如位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探索中心。那里,在六个活动区里,参观者可以打开罗马士兵的行囊、在蜡版上写字、把玩维京人墓葬出土的器物、或者制作海豹牙齿的项链。在满足普通大众需要的同时,该中心还特别针对满足5岁至14岁儿童的课程需求。它为学校的参观预留时间,并提供教师包和教师在职培训课程。同样,汉普郡博物馆服务部的动手中心《探寻》,主要针对小学生团体学习自然和历史的国家课程题目。其中一个区域是“进行中的考古学”,那里的工作区配备了显微镜和放大镜以观察材料。在展示了一个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证据的幻灯片之后,孩子们被鼓励去触摸和整理罗马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实物和复制品,寻找它们用途的线索,并构思有关那些居民生活的想法。

在2001年举办的临时展中,进一步通过《发掘》参与考古活动这个平台,伦敦博物馆采纳了“发现”的理念。在此,参观者可以在24条“探沟”中参与虚拟发掘,用铲子和刷子发掘实物和复制品。

汉普郡的《探寻》项目的副标题是“在教育中心

动手,通过发现学习”,从上述几项创新中,明显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让参观者触摸和近距离观察真实的考古材料有利于他们的教育。然而就如欧文所见,接下来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以实际证明参观者从动手或发现学习中到底获得了哪些教育收益。尽管这样,它们看上去很流行,也许只是通过提供动手触摸古代文物的体验所产生的愉悦、而非通过它们是否激发了进一步的学习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因为当前并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受众研究,我们仍然不清楚这种动手的创新是否确实扩大了考古学的受众,或只不过是给现有受众群体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

外借文物盒

博物馆设法扩大动手接触考古藏品和扩大受众范围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采用外借文物盒,这是博物馆外展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尽管在二战前已经很好建立起来,但是许多博物馆的出借服务在战后却因地方当局的经费削减而减少。然而,随着参与和教育规程的建立,文物外借盒作为教育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博物馆的服务中重新出现。雷丁博物馆(Reading Museum)是为数不多的将出租服务完好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博物馆,今天它共有2,000个泡沫充填盒,内有20,000件器物,包括了重要的一个考古学部分,涵盖了史前、罗马、盎格鲁撒克逊、中世纪、古希腊和古埃及的材料。这些盒子被送到当地的学校以帮助它们每学期的课程需要,并且每年约要制作4,000个盒子被33,000个小学生使用。

此外,作为博物馆将幕后过程公开总体措施的一部分,雷丁博物馆在其入口右侧建立了“盒子房”,里面有一个动手区,观众可以在那里观察尚未被借走的文物盒,并触摸一些器物,还有一个员工开放工作区,他们正在为外借的盒子做准备,回收归还的盒子,并管理整个程序。

进一步发展这个想法,伦敦博物馆已经重设了永久转让给当地学校的外借盒。调查显示,博物馆有关罗马展厅的学校服务内容不能够满足所有希望使用它的学校,每年可能有多达5,000名儿童被拒。此外还发现,最贫穷的学校无力支付前往参观博物馆的旅行费用。结果,博物馆建立了一个方案,为伦敦地区200座学校提供罗马材料的文物外借盒。这些盒子装有挑选的不分级的罗马材料,与复

制材料如灯和写字板,老师的笔记和录像带放在一起。现在每个学校都有一个永久性的微型博物馆可供使用,而博物馆也可以利用由于缺乏考古相关背景材料而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考古材料。

外延与包容

外借文物盒的工作意味着,现在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吸引观众的一处建筑物,而是一种服务,以协调它的工作来满足不同目的的受众。结果,外延工作已经成为提供服务的重要手段,它本身既是一个目的,也是博物馆普及自己的一个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外延涵盖了超越为其他博物馆提供展品的传统巡回展览,并为非传统场地和受众提供服务。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可以在考古发掘遗址上建造的写字楼里、在酒吧或机场和购物中心设置考古展览,就像伦敦博物馆已经做的那样,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意味着让移动博物馆直接走进社区。像印度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博物馆相对很少,而在英国,虽然移动博物馆的历史断断续续,但是像外借文物盒一样,它们正在作为外延方式的复苏与公众的参与而变得日益重要。

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在移动中发现”就是其发现中心的一个移动版本,它可以由博物馆、图书馆、学校、社区会堂及其他场合预约。它主要有五个专题,两个是有关考古学的作用。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们如何用证据来了解过去”,邀请观众参观今天的材料在一百年时间里会变成什么模样,并用三维拼图玩具复原一个破碎陶罐的形状。另一部分是特别展出当地的器物 and 证据,并随着目的地不同而变换。一个电脑信息装置提供有关苏格兰器物 and 地点的更多信息。

然而,这种外延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通常不想参观博物馆(特别是“被社会排斥的”)的新观众会参与进来。扩大观众的问题,特别是惠及被社会边缘化观众的问题,对博物馆考古学家来说是个重大挑战。如何让考古藏品与今天人们的生活产生共鸣,尤其是那些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博物馆之外的人?

应对这个问题就是将目标针对特定群体。例如,什罗普郡、赫里福德郡和伍斯特郡的郡县博物馆联合开发了一个“移动博物馆”,目的专门给偏远的农村社区提供社区博物馆服务,很多农村社区相当贫困。一部量身定制的 7.5 吨汽车载有一个展

览,可供前往学校、培训中心、养老院、棚户区、村落中心、医院、青年中心和购物中心。正如大多数外延项目所表明的,学科界限被消除了,考古材料和其他传统学科的材料一起在专题展览中展示。第一个展览是“咀嚼:古今食物简史”,其中包括了考古材料,以及具有特色的和可触摸的实物和复制品、“触摸箱”和“嗅味箱”、音像制品,还有一个悬挂的问答解说装置。

在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服务部是社区参与和外延的先驱,它已建立了“开放博物馆”服务,由可供社区团体外借的 20 个展览系列,及为学校、游乐场和当地活动提供的四个操作器材组成。其中一个操作器材叫“考古学游戏”,它是为视障和弱视儿童的使用而设计的。它附有盲文说明和教师须知。所有的展览和器材都是免费提供的。

这些展览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与当地群众一起合作开发的,所以作为项目的组成部分,展览筹建过程与终极产品一样重要。有些展览包含一个考古学部分,包括“挖掘戈万”,它具有维京人和戈万老教区教堂出土材料的特色。他们一般不借给其他的地方博物馆,而是借给教堂、图书馆和社区中心。

考古学和文化多样性

博物馆考古的初衷很少有针对目前少数族裔的项目,调查显示,这些人会觉得被博物馆文化排除在外。最近英国政府在对历史环境回顾时也强调的这点。认识到这点的是一次对英国历史和遗产公众态度的大规模调查,以及少数族裔的一些特定成员。调查显示,尤其是黑人对白人的主流文化及其遗产有疏离感,并不觉得这是“为他们”的历史环境。

英国考古学和考古博物馆如何在它们的受众中包容少数族裔的观众这个问题,一般不会令考古学家困扰,只用几个现有项目的例子,就可指明前进的方向。1993~1994 年,伦敦博物馆的“移居伦敦”项目,结合考古学和社会历史学证据,证明了伦敦文化的多样性从其最初岁月起就是该城市历史本质的组成部分。展览始于战后有关伦敦的一次调查,它确认多数游客的观点是对的:来自英联邦的移民在这一时期是伦敦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游客回到史前时代和末次盛冰期,当时英国是北欧洲一处无人居住的半岛。接下来,故事从冰盖

消退狩猎采集者进入英国低地说起,经过伦敦罗马聚落的建立,来自整个帝国的人在此居住。在中世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的聚落,以及工匠和海外商人的聚落。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作为航海和贸易的强国而扩张,奴隶贸易发展并有了在伦敦定居的第一批黑人。之后进入十八、十九世纪,有了爱尔兰人、犹太人、中国人、亚洲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非洲—加勒比人的定居,最后回到现在。通过这种方式,该项目包容了先前觉得自己与博物馆无关或不受欢迎的少数族裔成员,讲述的故事将他们的生活与千百年前的伦敦人联系在一起。除了展览本身,还有一个为学校 and 家庭的广泛的活动项目,一个教师盒、一本书、一个巡回展览,还有一个定点服务的艺术家。近十万人参观了为期六个月的展览,调查和其他评估技术证明,这个展览成功地将一批新观众吸引到博物馆来,与展前4%的数量相比,有20%到博物馆参观这个展览的观众声称他们是少数族裔。

伦敦萨瑟克区的卡明博物馆(the Cuming Museum)是以埃及和英国古物收藏为基础,直到十年前主要还是迎合一批人数不断减少、主要是爱好考古学和当地古物的老年人群。今天,博物馆所在地族群差异极大。近年来,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没有忽视当地观众,而是试图将藏品和当地群众联系起来,他们将展厅的一部分用来做面向儿童的当地考古的动手项目,用便于理解的个性化方式来撰写历史展览文本,还在中心位置设立了一个动手发掘的探坑。通过当地议会的教育和外延部门,博物馆走向学校和社区中心。通过博物馆内的动手项目,在考古材料与观众体验之间建立起联系,比如罗马时代的灯很像今天印度人家里用的灯。通过针对差异很大的当地社群,尤其是当地的学校,现在博物馆发现其60%的观众来自少数族裔。这也许表明,通过集中于“地方”的概念,考古藏品可以和观众建立联系,这些观众未必赞成深植于共同过去共同身份的认同,这些直到最近一直是考古展览所宣扬的。

考古的艺术

发展新方法来利用考古(和其他)藏品的一个特别途径,是通过强调创造力和想象力来利用考古藏品。在大多数博物馆的场景中,这包括了创造性艺术家的参与,他们会利用藏品作为灵感的来源,

并在博物馆的空间里植入自己的创造。虽然这样的植入可能要揉合历史展览和艺术布置之间关系的构思,并有可能通过拙劣模仿、扭曲和故弄玄虚来予以表现而破坏了博物馆的规则,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问题和破坏究竟偏离了高度有文化修养的博物馆核心观众有多远。美国艺术家马克·迪翁(Mark Dion)的工作是个例外,他的工作挑战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界限,通过在田野工作的“探险”中收集材料,并从他的发现中挑出奇珍放在橱柜里,这些展览是放在艺术馆而非历史或科学博物馆里。1999年他的“泰特泰晤士河发掘”是一系列“发掘”的第四次,他将世界各地收集的破罐碎瓦放在桌上或橱柜里展出。这个项目中,采集、清洗和分类从英国泰特博物馆(Tate Britain)和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馆址附近泰晤士河沿岸出土材料的过程是这一项目的主要部分,并在英国泰特博物馆草坪上的帐篷里向公众展示。关键的是,在这个项目中,迪翁挑选当地社群作为他“田野工作”的民工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和清洗河滨出土的材料,贴上标签并加以包装,回答公众的问题,并且参加专家有关泰晤士河及其历史方面的讲座。这是一种有效的社区考古项目,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社区参与者是少数族裔,但这个项目是在艺术馆而非考古博物馆举行的。

为探索正在利用的考古藏品的新用途和新观众,博物馆考古家协会和英国博物馆考古学家专业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考古的艺术”的项目,鼓励创造性地利用考古藏品。从2000年5月到2001年3月间有十家博物馆参与,并从文化遗产彩票基金获得资金帮助。其中有些值得稍加详述,因为它们为博物馆考古学家目前设法推动更多利用考古藏品的方式提供很好的榜样。

诺丁汉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建立了一个名为“揭示考古”的项目。一个元素包括来自城市某地的一些年轻母亲为展览建造一个陶艺设备,还包括一些小学生冒被当地学校排斥的风险用埃及藏品作为灵感来制作展览的横幅。

在都市博物馆,这种创意并非不同寻常,虽然他们已经很少利用考古藏品来行事。虽然撇开常常忽视贫困和服务差的问题,这类工作在农村地区展开更不常见。考古藏品在农村地区展开外延伸项目中潜力很大,因为它们见于每个地方的历史博物

馆,而且因为大部分这类材料一般都很质朴,能积极加以利用。

例如,什罗普考古服务部利用一处罗马别墅和中世纪修道院出土的材料建立一系列特别针对克雷文阿姆地区的活动,这是一个公认的农村贫困区。这些活动包括一个艺术设施、一个歌咏会和一个讨论会,其中一位彩绘玻璃艺术家用中世纪的彩绘玻璃碎片与大家讨论如何用它们来重建过去。其中两个研讨会也进入当地的学校,结果它们都到当地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了一系列的巡回展览。

在另一个农村地区,赫里福德郡博物馆的项目包括与当地的英国皇家国立盲人学院开展合作关系,开办了一个为期五周的主要以博物馆收藏的考古陶器为基础的“陶瓷技术史”课程。该课程是为想获得娱乐艺术和设计职业资格的学生开设的,并且他们作品的成果在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展出。

北拉纳克郡博物馆针对格伦伯西和卡多恩两地作为贫困和社会排斥地区,通过该博物馆的工业考古学和社会历史藏品,开展一个着眼于该地区工业遗产的创造性写作项目。活动涵盖了广泛的参与者,从小学生、青年人群体到成人,他们的活动在一次公众阅读和出版中达到高潮。同样,伍斯特市博物馆基于它的考古藏品开办创造性写作班,涉及学校、一家休闲俱乐部和成人团体,其中包括了一批残疾人。

对这些项目的评估明确显示,大多数项目成功地成为考古藏品带来了新用途和新观众。所有参与其中的博物馆感到,这些项目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并且如果资源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希望能从事更多这样的工作。显然,这能促进更多更广泛地利用考古藏品,并且被更多的观众利用。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工作需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时间上得到重要的保障,目前尚不清楚它们的效果如何,或影响将持续多久。

观 察

这篇概述证明,考古博物馆或拥有考古藏品的博物馆现在已开始对自己重新定位,从原先关注他们藏品和考古学学科的需要转向公众需要迈出了重要一步。许多创意的杰出之处,是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思维方式,不是强调传统的方式,即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

公众做些什么。虽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当考古学表明与当代社会相关,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但这确实意味着,考古学不能再仅仅从其公平的学术性和客观性理由来证明自己,它也必须在对回馈当今社会的承诺上做出平衡。

就考古博物馆而言,英国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列,这主要是因为非考古界对整个博物馆界施加的压力。但是,整个考古学界拥护让观众参与、为他们提供接近和使用考古藏品和知识的方便、并为社区的不同单位提供服务的想法,对于一种较为公众取向的考古学来说前景确实令人振奋。然而,从当前实践的回顾来看,仍然需要面对许多问题(比如经费)。

回到器物,上面概述的许多参与创意的许多方面,比如可参观的库房、联网数据库、动手活动和艺术项目,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似乎是代表了器物的回归。与博物馆一些社会历史学方法主张淡化器物而偏重历史背景和阐释的最近方法相反,最近许多博物馆考古注重器物本身,将历史背景最小化。强调器物内在的特质,也即它们的触感、古朴或非同一般的“韵味”。观众被邀请为器物而接触器物,而非作为重建历史而了解过去文化元素的证据。虽然在提供背景关系的地方,器物往往被用来表现发掘过程、储藏、保护和研究,但是在探索器物历史意义的地方,却很少能够超越分类、断代和技术功能。

注重器物本身而又强调受众的各方面体验,这与当前博物馆教育理论很对路,即强调有效的、非单线的和自我主导的学习,让受众从中构建他们自己的知识。多元化受到欢迎,接近真理并不违背衡量观众理解的标准。这些方法强调博物馆最好是做到能激起诸如惊奇、敬畏、神秘和“异类”这样的感觉。集中于每件器物特有的“韵味”,会激发一种建设性的、诗意的和与常理有异的方法。这也是一种对所有人可用的方法,其中未必需要考古学知识,甚至也不加鼓励。参观者可以欣赏馆藏的丰富性,会对器物的美学特质作出反应,还可以培养一种对材料主观的情绪反应,而无需知道任何有关历史背景和器物本身的解释。这是一种审美途径,基本上将藏品当艺术品来对待。

不言而喻这些方法放弃解释,实际上可能是对博物馆考古学表现批评的一种的正当回应,这种批

评视展厅的介绍带有无可救药的偏见而且不全面。但是,专注于为考古藏品、特别是有形藏品提供参与,博物馆馆长有鼓励器物“会自己说话”这种想法之虞,或者以放弃历史解释为代价来表现考古和博物馆的过程。沙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很好指出了这点与科学解释的关系,她声称,虽然“主动的受众”被视为民主和参与解释的理想表现,但是受众所表现的实际选择范围实际上限制了关键参与的各种可能而不是使他们更开放:“因此,并非只从‘活动’或‘做选择’来读懂‘民主’或‘赋予权利’,重要的是要了解那些参与者是如何看待和参与活动的,他们提什么样的问题,没提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这种方法的偏颇可能意味着历史会成为一种玩物的后现代主义担忧,除了成为被观众消费的东西之外毫无意义,这有可能成为现实。虽然通过这些创意可以提供更多的参与,但是参与了什么?现在博物馆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要增加他们观众的数量,也要拓宽他们的思维。

利用“感知的想象力”无需放弃博物馆推广历史知识的作用,而增强从学术上理解考古藏品的一个方法,就是与前面提到的感受、触摸和创造性的方法一起,介绍历史的背景。这种方法已有模式可循,我称之为“感知的想象力”。我的意思是,一种解释方法是基于策展专家所提供材料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背景知识,但是它承认观点的多样性,考古解释的偶然性,并鼓励观众自己在对历史的构建中发挥想象力和得到乐趣。

这种方法的要素可以在伦敦博物馆以前的史前史展厅里看到,它采用了现代对史前期陈规老套的描绘、一种明确的解说规范、能够触摸器物、过去和现在景观之间的联系、用一种诗意的方法撰写文本、以传递五十万年来变迁的意识。后者也是苏格兰博物馆早期展览文本主题的一个明显特征,就如“流血、武器和英雄”部分那样:“起初,我们用棍棒和弓箭战斗。后来我们用剑和矛作战。我们武器越来越好,我们的战士越来越勇猛。罗马人的军队不计其数。他们像蚂蚁一样移动。他们的武器杀伤力很大,他们的战马令人生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和他们战斗。”这代表了博物馆考古学解释的一种全新方法。我们采用一种充满情感、体验的叙述,而非学者枯燥和不着边际的描写,它借鉴诗歌和小

说,含蓄地让观众从他们在展馆看到的证据和信息来构建他们自己的故事。

这种展览试图从实际和潜在观众的偏见和态度的研究获得信息,这是能进行成功沟通的原因之一。最近的临时巡展“古埃及:为梦想而发掘”,是由埃及皮特里考古博物馆、克罗伊登博物馆和格拉斯哥博物馆制作,同样从这种研究中获得了信息,特别是从那些本不愿意来看博物馆的人中,比如少数族裔成员。展览的开头用套路方式处理古埃及,例如,就如电影“木乃伊”所展示的。弗林德斯·皮特里发掘和发现的藏品被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加以讨论,然后探讨了当时考古学的政治掠夺,比如纳粹利用皮特里发现的木乃伊肖像来支持种族见解。

展览的主体是致力于古埃及与今天社会关系之间的各种议题。其中一个关注是人类对待遗体的处置,在展览中,箱子里的木乃伊被裹尸布覆盖,如果观众想看的话就把它掀起来。观众被邀请在明信片上填写他们对人类遗骸展示的看法。展览的其他部分涉及人种和肤色问题,观众调查显示黑人群体对这一部分特别关注,还有古埃及受新时代信仰影响的方式。最后部分审视了古埃及如何进行营销和消费。一个简短的视频展示,古埃及对不同人的个人含义,其中涉及专业的埃及学家到黑人小学生。

博物馆里考古学对过去做出阐释的最后三种方法,为未来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即对考古学的阐释可以进行试验和辩论,观众和他们的理解被放在首要地位,充分开放藏品的工作与解说和背景重建的创新方法结合起来。公众看来反应良好,没有对经常被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视为背道而驰的东西感到奇怪。那么,这也许是我们因担心被我们同行的评估所否定而裹足不前。也许现在是多听我们潜在观众意见的时候了,并在我们的工作中稍微多冒点风险。

注释:

里维埃和德瓦兰思想(the thinking of Rivière and de Varine):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提出平民化诉求,以“去中心化”反对国家极权统治。该运动使得乔治·里维埃(Georges Rivière)和于迪·德瓦兰(Hudues de Varine)提出,博物馆也应去中心化而面向大众。该运动也是生态博物馆潮流的肇始。



域 外 视 野

本 期 导 读

一、《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

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考古学”的术语和理念。西方学界认识到,为了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和考古研究的可持续性,依靠专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必须依赖全社会的介入,包括政府和公众。因此,公共考古学不单是面对公众的普及,还要求政府的职能的全面介入。目前,“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由一个形形色色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来阐释过去。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英国考古博物馆改变功能定位,从考古专家的仆人,转向以公众为中心,以吸引和沟通各社会阶层的大众为己任,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方式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有益实践与成功经验,包括服务对象的重新定位、传统功能向外延伸,从静态展示向为观众提供动态的展览服务如走进社区的“移动博物馆”和出借文物盒、鼓励受众的参与和互动、网上连接、开放库房和研究部门、为残障儿童开发考古游戏、吸引少数民族群参与、举行陶艺与玻璃艺术研讨会和文物欣赏写作班等等。这些举措反映了当代博物馆和考古学思维方式的新趋势,这就是:不是强调公众能为考古学做些什么,而是强调考古学可以为公众做些什么。公共考古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能力。虽然我国博物馆采取免费措施来吸引观众,但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如果真的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和认识的提高,博物馆可能更需要在展示形式、营销策略、服务内容和主动性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陈 淳)

二、《陶器生态学 近东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种途径》

陶器和陶片是考古发现中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万多年前出现后,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伴。因此,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1960年代之前,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然而,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本文刊载于1965年出版的《陶器与人类》这本论文集,受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作者提出了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试图将陶工使用的原料和技术、陶器在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陶器生态学认为陶器是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生物和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因某一主要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陶器的变化可以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关系来了解。作者根据近东生态学的特点、缺水环境中人们对水利用的方式、还有陶工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分析了陶器在该地区生产和使用的特点。最后作者指出,长期以来陶片被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材料,而其作为人类生产和使用的方面信息则被漠视。他呼吁,应该将年代、技术、审美和生态方面的多种关注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类物质遗存。我国的陶器研究也应走出年代学和文化关系的窠臼,努力用这种丰富的考古材料来提炼各种宝贵的历史和社会信息。

(陈 淳)